

# 第四届“美国的战略走向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sup>1</sup>

蔡翠红

2009年12月21日到22日，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第四届“美国的战略走向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40余名来自外交部政策研究与规划司、美大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防大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南京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学会、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代表再聚复旦，对“美国的战略走向与中美关系”进行探讨与解析。在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分别针对美国政治与经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中美关系展望等几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一、美国经济与国内政治

### 1、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的挑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甄炳禧研究员首先回顾了金融危机发展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8年9月中旬到10月底）为金融危机最严重阶段，美欧金融体系陷入系统性倒闭困境，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振荡；第二阶段（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衰退深化；第三阶段（2009年第二季度）金融危机趋于稳定；第四阶段（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经济衰退触底回升。

金融和经济形势好转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规模空前的干预政策。甄炳禧研究员总结了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大措施。一是采取超大规模的金融“救市”措施和约2万亿美元的“金融稳定计划”。二是美联储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特别是2008年12月以来采取零利率政策。三是美联储推出了定期拍卖工具、短期证券借贷工具等10种新型流动性支持工具。四是奥巴马政府2009年2月出台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五是2009年2月推出的2750亿美元的《房主可支付和稳定计划》。六是2009年6月公布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七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临时流动性担保计划，为金融机构2012年6月底到期的无抵押债务提供担保。八是2009年5月，美国财政部等对19家大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使这些金融机构在未来两年继续持有充足的资本金。九是为救助汽车业，政府拨款174亿美元，并实施“旧车换现金”计划。十是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推动二十国集团召开金融峰会，共同应对和缓解危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潘锐教授则补充了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美国经济如何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担任世界最后的市场和贷款者及全球增长的火车头，未来是否胜任这些角色，已受到质疑。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美国经济陷入困境，复苏艰难。对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作用熄火。当然，这里也存在美国的意愿问题，即美国是否愿意重新担当这一角色。二是美国的退出机制问题。危机后美国提出了大幅财政刺激计划。但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逐步降低赤字及

<sup>1</sup> 本文发表于《美国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期。借此机会，作者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对初稿的审阅与修改意见。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如何使私人消费取代政府刺激等等退出机制问题将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

## 2、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走势

甄炳禧研究员还对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走势进行了预测。总体而言，他认为美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同时美元持续贬值导致其地位继续下降，美国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受损。因为这次美国经济复苏受到许多下行压力的拖累：第一，消费开支不会像过去那样出现“井喷式”增长。第二，美国金融体系还存在不少隐患，如恶化的信用卡问题、大量银行倒闭、高风险的交易继续在金融机构进行。第三，主要金融机构“去杠杆化”仍未完成，继续收紧信贷。第四，住房市场忽冷忽热，商业房地产问题继续恶化。第五，全球或一些地区存在股市、房市泡沫破灭的隐患，如迪拜及一些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此外，美元持续贬值加大了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不少国家在考虑用其他货币代替美元储备和结算职能，加上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长期存在，美元中长期走势将继续疲软。

不过，甄炳禧研究员同时指出，在较长时期，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的地位仍将难以被替代。美国仍有强大的修复和调整能力。借助于美元贬值，美国部分转嫁了其损失。美元贬值可以帮助美国削减大量外债和美国出口增长，从而摆脱巨额赤字。奥巴马政府不会立即“退出”刺激举措。同时，美国的巨额债务虽然可能牵制对外扩张行为，但也不会实质影响其全球战略。潘锐教授指出，金融危机使美国多年来的积累矛盾通过国际机制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领域领先世界的基本格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也认为，美国是否会衰落可以看军费是否缩减，以及是否有能力支付公共产品。在未来较长时期，美国一超地位仍将难以撼动。

甄炳禧研究员还分析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三大“再平衡”。一是经济复苏从政府需求转向私人需求支撑。目前，美国经济主要是政府刺激带动下复苏的。随着政府刺激作用的逐渐减弱，经济复苏必须建立在私人需求增长的基础上才能稳固和可持续。但由于企业产能严重过剩和个人增加储蓄，私人需求增加难以弥补政府需求递减造成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从消费转向外需拉动。危机期间消费增长率下降为负数，储蓄率从 2007 年几乎零提高到目前 4%。未来几年，美国将继续调整增长方式，并要求中国等亚洲经济体降低储蓄、增加进口和扩大消费。三是从“高碳”转向“低碳”经济。危机催生新技术和新产业。最近，美国加大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大力发展新能源等绿色产业，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有可能引发美国乃至全球产业结构新的调整和升级。

与会专家还谈到了金融危机及美国经济模式转变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可能影响。甄炳禧研究员指出，美国储蓄率提高 4%将使美国需求每年减少 4000 亿美元，而中国等亚洲国家不可能填补这一缺口。因此，在失衡调整期间，美国经济增速将低于危机前，中美贸易、汇率摩擦也将增多。保护主义则是另一可能影响中美经济关系的议题。潘锐认为，美国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提法就是其保护主义借口，也是其推卸责任、调节失衡及赢回话语权的手段。但是，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国兴研究员认为美国保护主义问题目前阶段还不很严重。首先，他认为中美市场并不重叠，竞争性不强；其次，美国经济转型后的出口刺激方案本身就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不可能很严重。然而，20 或 30 年后中美经济都转型并逐渐趋同后则可能会产生真正的问题，例如随着人民币的逐渐国际化，中美最后在货币金融方面可能会出现保护主义问题。

### 3、美国国内政治博弈

美国国内政治一直是其对外战略的限制因素之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副教授解读了奥巴马新政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特别是奥巴马上任之初于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出的三大“改革”任务,即清洁能源改革、医疗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在清洁能源改革方面,白宫的政策是2005年的基础上,美国在10年内减排温室气体17%,2025年减排30%;2050年减排83%。为此,国会相应推出了数项法案,如众议院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H. R. 2454)和参议院提出的《清洁能源工作与美国动力法案》(Clean Energy Jobs and American Power Act)(S. 1733)。医疗改革方面,白宫的政策目标一是通过立法严格规范保险公司,二是全民普遍原则,三是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公共保险公司。众议院相应提出3项法案,最重要的为《美国可负担的医疗法案》(Affordable Health Care for America Act)(H. R. 3962);参议院提出5项法案和一项修正案,最重要的为《可负担的健康选择法案》(Affordable Health Choices Act)(S. 1679)以及《2009年美国健康未来法案》(America's Healthy Future Act of 2009)(S. 1796)。金融监管改革方面,白宫的政策是设立并系统执行更为明确的金融监管法规,建立更稳定的金融系统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参议院未提出相应法案,众议院则通过了3项法案,最重要的为《2009年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The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9)(H. R. 4173)。

如果考察这些法案通过的比例,信强认为两院立法博弈有如下特点:一是众议院法案均属“涉险过关”,仅有数票差距,同时也发现相对于共和党,民主党内部分歧严重。二是两院步调不一,参议院行动迟缓,明显滞后。奥巴马的强力推动、民主党对两院的掌控、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舆论的压力是这些法案通过的利好因素。但是不利因素也很多,“机会之窗”十分短暂,原因包括参院多数党(民主党)权力基础脆弱;共和党态度坚决一致而民主党内分歧严重;参议院民主党的弱势领袖;众院表决优势微弱,两院协调不易;奥巴马光环褪色,“政策牛肉”有限;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推进改革的难度可能加大等等。信强副教授对这些法案的通过表示谨慎乐观,估计1至2项法案获得通过,但将被大幅修改和“缩水”,导致奥巴马“新政”效能大打折扣。

同时,信强副教授指出,任何一项法案的通过均将对美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清洁能源法案是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案,这将影响涵盖美国85%的行业和领域,转变美国生产和利用能源的方式,改变美国能源结构,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产业革命”,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导致世界能源体系的重构,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由能源主导型转变为科技主导型。医疗改革法案则为美国社会注入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在未来10年内医保覆盖面达到总人口的96%的目标将导致“全民医保”。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则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改革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财长Timothy Geithner语)。它冲击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传统的“小政府”将“变大”,“大市场”将“变小”。黄仁伟研究员最后指出,美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对世界的前景影响很大。这将是个体很漫长的过程,美国的改革将反复在改革目标与路线图之间摆动。

## 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

### 1、外交政策转变

在外交政策重点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等多位与会者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改变首先是在衰落背景下，明确以国内优先和经济复苏为主，以及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采取扩大出口的策略等。与国内优先相对应的是，时殷弘教授指出在明确不影响海外安全和不引起国内分裂条件下，美国对外战略有显著海外收缩特征。

其次是在外交策略方面，增加软力量成分以及单边向多边的转变。“灵巧实力”（或“巧实力”、“Smart Power”）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以奥巴马政府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变化为例说明其对外政策的软化，小布什第二任期内仍表示伊斯兰世界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而现在奥巴马对伊斯兰的表述发生了转变。时殷弘教授认为奥巴马的外交风格与他本人个性相关，因为奥巴马很务实，意识形态因素少，具有实践精神，并希望靠亲和的吸引力进行战略集中。黄仁伟研究员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从单边向多边的转变尤其体现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国开始认识到伙伴关系不一定是美国领导下的伙伴关系，从而具有了形式上伙伴关系的某种平等。

第三是美国区域战略变化方面向亚洲的转移，即“重返亚洲”，同时以美国为主导的美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王缉思教授也专门提到了美国对亚洲从忽视，到善意的忽视，再到主动参与的态度转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则指出以美国为主导的美亚关系可能将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转折。虽然奥巴马将亚洲看作其第二故乡，但改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奥巴马的亚洲情结，而是亚洲自身的变化。安全方面，以前美国的同盟体系等不再有效，特别是恐怖主义、朝核问题、阿巴问题等方面的挑战需要新的合作联盟。经济方面，因为中美利益存在很多交织，所以对中国采取贸易战或制裁等手段显然不行。政治层面，美国一直自称是民主领袖，但是目前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已超越了意识形态，所以美国无法以传统方法影响这一地区。所以，与以往的美国高官来访者不同，奥巴马 2009 年访华并没有提过美国在亚洲的领导作用，这或许暗示了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或主导作用的变化。

### 2、美国的亚洲政策与问题

黄仁伟研究员认为在亚洲美国存在“两元体系”，即美国的盟国体系和以中国为主的区域合作体系。美国在向亚洲转移战略过程中则面临三方面问题，其中东北亚是其“重大问题”，南亚是“紧迫问题”，亚洲区域合作机制是“外围战”。

东北亚方面，黄仁伟研究员认为总体而言美国与本地区关系最近三年将向松弛和不紧密方向走。美日同盟关系中美国控制力在下降，对美国本身及其盟国体系都是根本挑战，尽管倪峰指出美日同盟五周年即 2010 年或许是美日同盟改善的适当时机。时殷弘教授则反驳了黄仁伟研究员的观点，认为日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衰落，同时美韩联盟向松弛方向发展的判断有些过早。中国国防大学杨毅少将也认为今后三年美日同盟的松弛化趋向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其国内问题的存在情况下。在朝鲜半岛，美国对北朝鲜采取了缓和与接触的政策，基本放弃了零核目标，退而求防止其核扩散的目标。黄仁伟研究员预测认为，2012 年朝鲜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除了金正日的身体因素外，到时美国军队将从三八线撤走，韩国的亲美派会发生变化，美国也会选举新总统等，所以美国要为 2012 年做好准备。

在南亚，美国也在加大接触与合作力度。黄仁伟研究员认为，巴基斯坦政局呈现“塔

利班化”，或者至少碎片化，表现为地区分裂和政权分裂，这会带来两个危险，一是恐怖主义活动在巴基斯坦甚于阿富汗，二是恐怖组织与核武器的结合风险。而且如果巴基斯坦形势恶化，美国的阿富汗目标则很难达成。所以，美国仍承诺了巴基斯坦大量资金支持以及一些技术支持，甚至还要求中国加强支援与军事卷入等。美国还支持印度在藏南地区强化与中国的对抗。同时，美国开始与缅甸军政府接触。结果是中国的三个小邻国即巴基斯坦、朝鲜、缅甸都与美国加强了接触。

在亚洲区域合作机制方面，黄仁伟研究员认为，显然美国希望进入亚洲的合作体系，同时稳定其盟国体系，但两者兼顾有一定难度。美国一方面要求加入“10+6”体系（‘10+3’+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求 APEC 实体化，成为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又希望澳大利亚等重组合作机制等。日本目前提出了“东亚共同体”设想，没有与美国商量，让美国始料未及，对美国是重大打击。虽然中国没有明确给予答复，但是美国最担心的仍是中日合作联手。但是，在重返亚洲的过程中，美国也已经很清楚地将中国定位为第一伙伴。

### 3、外交转变的性质与意义

学者们普遍认为奥巴马的外交调整是战略性的、长远性的，而不是策略性的、短期性的。王缉思教授认为这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改变。公共外交是民主党的长处，例如与非政府行为体的接触等等。同时，奥巴马非行政官僚出生也使其成为第一位摆脱了冷战思维美国总统。二是当前的全球背景，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威胁的存在。三是全球战略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实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以及 G2 的提法使美国不能仅仅通过西方联盟来进行全球治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研究员也赞同奥巴马新政府的新理念新变化是长远的并具有战略意义的，并认为这反应了当前世界和美国的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进入了新时代，即全球化时代。他认为后现代其实就是全球化时代。奥巴马的新思维、气候变化议程突出等都是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标志。后冷战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后冷战时代的红利开始消失。美国面临着如何适应这一时代的问题。二是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欧美已进入后现代阶段，很多国家处于现代化阶段，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前现代阶段。他还指出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已经是跨越式发展，但是后现代问题业已出现。

## 三、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

### 1、总体安全战略背景

奥巴马上台后对其安全战略的实践有很多改变，因为奥巴马是在一场危机（金融危机）和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背景下上台的。杨毅少将认为考察美国安全战略最重要的是三点背景，一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二是奥巴马政府的执政理念，如巧实力概念，三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权力基础的构成要素的不平衡，即政治经济霸权削弱，但是军事霸权依然强劲。总体而言，黄仁伟研究员认为，美国的安全战略“有退有进”，例如美国重新评估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计划是某种形式的“退”，但是阿富汗方面则是某种形式的“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认为，小布什时期，美国的安全威胁主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核安全、地区不稳定因素以及新兴大国的发展带来的压力。

而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则代表了中长期安全威胁,也是当前奥巴马新政府所重视并着力应对的。当然,其应对仍然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束缚。

为了适应美国的新安全战略,杨毅少将还专门提到了与此相对应的美国军事资源的重新配置。例如,在常务国防副部长挑选过程中注重低端和高端能力,成立网络司令部以提高远程打击力等等。美国安全战略的目标是达到三个平衡,即打赢当前冲突与针对未来军事对手的平衡;应对非常规威胁与保持对所有军事对手优势的平衡;保持传统文化痕迹与适应新环境的平衡。

## 2、反恐与防扩散战略

小布什高举反恐大旗借助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扩张,抢占战略要道,夺取战略资源。而奥巴马则在前述背景下改变了以反恐划分的单边主义。杨毅少将指出,奥巴马开始摒弃反恐战略一词而强调 3D,即外交(Diplomacy)、国防(Defense)和发展(Development),即综合运用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重建国际反恐战线以争取最大限度支持,同时支持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内发展和建设,从而回到了反恐战争的正确轨道。他认为奥巴马的反恐战略有四个关键点。一是以退为进,降低目标。在宣布增兵阿富汗的同时提出了 2011 年撤军计划。二是综合治理,多管齐下,进行阿富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建。三是突出巴基斯坦在反恐战略中的作用,因为基地组织已经将巴基斯坦作为大后方。但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刘学成研究员表示了对巴基斯坦选择性打击其境内的塔利班以及巴基斯坦军事政变的可能性的担忧。四是试图拉更多入伙者,从而让更多人承担责任。此外,参照小布什在伊拉克的教训,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战略力图利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武器,从而减少人员伤亡。

阿富汗是美国反恐战略的核心之一。沈丁立教授指出,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逐步撤军的决定是无奈的,一方面,美国不能不对被认定为恐怖主义的地方进行行动,从而体现负责任形象;另一方面,美国同时也必须考虑撤出,即使不赢也必须走。民主党公开表示要撤军(如奥巴马 2009 年 12 月 1 日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提到撤军),因为如果继续打下去,就可能重蹈苏联覆辙。当然也不排除该走而走不了的情形。吴心伯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朱威烈教授也赞同撤军可能不是美国可以控制的,因为阿富汗是个非常世俗的国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研究员也指出美国在阿富汗面对的地区民族风险很大,因为从历史来看,阿富汗是个始终不屈的民族,历史上几乎一直是“帝国的坟墓”。外交部美大司马占武参赞则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在阿富汗的目的是为了反恐还是为了维持军事存在。如果是前者,美国就可能适时撤军,而如果是后者就或许还将继续其阿富汗驻军。杨毅少将认为,美国对阿富汗有两手准备,目前主要目标是反恐,但将来的目标则可能是通过建立基地等施加政治影响。沈丁立教授则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只要是对其有利的选择都是有可能的。

防扩散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另一重要方面。从零核世界的提法到 2010 年 4 月份的核安全首脑会议,都体现了奥巴马的新安全战略观。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认为,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有全球化思想的总统,他能抛弃冷战思维,提出零核世界的理想。但同时他也很现实,知道他活着不可能看到该目标的实现。核扩散形势总体而言非常严峻。郭宪纲研究员认为美国明知道伊朗悄悄推进核武器也无可奈何,尽管伊朗也不敢太得罪美国。朝鲜肯定已拥有核武器,而且对美国态度强硬。夏立平教授则对朝核问题用了两个字,美国在分身无术的情况下采取“拖”的策略,而朝鲜则是采取“骗”的策略。

### 3、美国与诸大国的安全关系

杨毅少将认为美国与诸大国的安全关系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即“拉印抚俄防中”。在美国“重势不重态”的战略哲学影响下，美国对几个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非常重视。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拉拢印度是美国推广民主的旗帜之一。对传统军事大国俄罗斯，美国则采取了安抚态度。俄罗斯以攻对攻，美国以退为进。而中国则是其重点防范的对象。

防范中国是美国的安全战略核心之一。美国的忧患意识非常强，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因素在美国全球和地区安全战略中重要性加强。但是中美之间与美苏全球争霸不同，与美俄之间的刚性冲突也不同，具有可塑性。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是一种前瞻性和防范性的战略。针对于此，中国不能消极等待机遇，而应积极塑造安全环境，一方面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积极塑造利益复合型和利益平衡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与周边的利益共同体加强合作。杨毅少将还认为，中国因素在美国安全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背后的原因除了将中国作为谋划的战略点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防预算的理由与借口。

## 四、2009 年的中美关系

### 1、2009 年中美关系进展

外交部美大司马占武参赞受邀从外交实践者角度对 2009 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总结了 2009 年中美关系在高层互访、合作领域拓展及共同应对全球危机等诸多方面的重大进展。他认为，这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保持平稳，迅速发展。在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总统新上任背景下达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2009 年高层交往频繁密切。奥巴马、佩洛西相继访华（多年来美国议长首次访华），吴邦国、徐才厚先后访美，这些为双方增进理解打下了基础。四月份中美首脑在伦敦会晤，并确定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即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七月底华盛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一半以上的阁员参加，举世瞩目。十一月份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在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的“战略再保证”概念基础上提出了要增进战略互信。

2009 年的中美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各领域都有拓展，全球性问题与双边问题磋商同步增长。例如，小布什期间中断的中美防务磋商七月份在两军间进行。经济方面，不仅中美财政部之间进行对话，人民银行与美方机构也有相应往来等等。同时，过去一年中金融危机也为中美合作提供了契机。此外，虽然中美分歧仍然存在，但是过去一年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无暇”号和“胜利”号事件上，中美尽量不炒作，低调处理。2009 年涉台（售台武器）、涉藏（奥巴马未见华盛顿的达赖）、涉疆（奥巴马未见热比亚）上有一定成果。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江波秘书长还专门就中美之间规模逐渐增大、领域逐步拓展的双向教育交流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马占武参赞认为 2009 年的中美关系体现了一种“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相应崛起而美国相对衰落，中美相互依赖增强。“地利”是指 2009 年全球国际格局的变化更明显，多极化加速发展。“人和”则是指中美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视。外交部、军方、财政部、卫生部等等都积累了大批专家和能手，美国也有一批知华派上台，这些都是中美沟通和高层对话的基础。

## 2、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

马占武参赞同时也指出了中美在战略互信、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海上安全、三涉（台湾、西藏、新疆）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依然存在分歧与矛盾。中美关系没变的方面是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最主要的问题首先还是战略互信。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中国似乎无止境的发展都使美国感到威胁和担心。两军之间也缺少互信，为海上安全问题解决增加了难度。在经贸问题方面，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在三涉问题方面，美国依然没有放弃在两岸关系上的以台制华战略，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表示了对热比亚的公开支持，奥巴马也可能在国内压力下会见达赖等。反恐问题上，我国主张平等和双向互利。但是在反恐组织的认定上，美国实施了双重标准，例如虽然我们提供的东突组织资料很多，但没有被成功认定。所以说，尽管 2009 年的中美关系总体有积极进展，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倪峰研究员谈了对 2009 年中美关系的两点正面印象，一是开局良好，中美关系未受美国政府更替影响，二是双边关系机制化程度有了深化，军事交流也有了发展。但也指出了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几方面问题。一是机会之窗问题。虽然中美关系 2009 年开局很好，但是后面可能会有空档期，例如 2010 年中期选举的可能影响等等。同时，虽然新政府的对华态度很积极，但是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舆论没有发生改变，也就是政府与老百姓对中国态度存在落差。二是中美关系机制化程度虽已很高，但是也有进一步深化的问题。三是中美两国期望值存在落差。奥巴马是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的，对中国的期望值很高。如何管理两国之间的期望值是个挑战。马占武参赞也赞同并认为中美期望值问题上很难有超越性的发展。宗教问题方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宗教问题研究专家徐以骅教授指出 2009 年虽然是宗教小年，表面波澜不惊，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暗流汹涌，宗教因素有增无减，宗教因素不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但是肯定是中美关系的温度计。

中美之间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系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问题，即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对台军售和达赖始终是中美关系的两个难题与瓶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甚至指出，中美关系中的其他摩擦可能加剧，但只有台湾问题是可能颠覆中美关系的。二是其他重要问题，如南海等军事安全问题、经贸关系、核问题以及政治上的战略互信问题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认为，南海问题包括两对矛盾，一是中国与美国的海权矛盾，二是中国与五国六方的主权矛盾。两者中哪个更重要是值得考虑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研究员也认为，目前中美关系还有许多问题，中美互动还没有形成固定模式，双边关系、地区层面以及核心利益层面都还有不少分歧点，在共同应对全球问题方面的责任义务也不同。在双边关系层面，经贸问题是最直接的。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处于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下。双方都需要花很多成本。在地区层面，中美对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立场都有不同。在核心利益层面，双方的分歧更为深刻，西藏问题也经常被美国作为杠杆使用。因此，陈东晓研究员建议核心利益方面中美也需要进行一些互换。

## 3、2009 年对中美关系的意义

外交部政策研究与规划司乐玉成司长的主题报告对 2009 年的中国外交与国际格局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哥本哈根事件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或者发展主导权问题，而是国际格局主导权的问题，并指出了金融危机、国际力量对比以及全球治理与发展模式变化背景下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虽然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基本面没有变化，但是以美国单边独霸为特征的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西方价值观的一统天下不复存在，美国的主导力和影



响力开始下降。

吴心伯教授分析了 2009 年对中美关系的意义。他认为 2009 年代表了中美关系的转折，这种转折不仅仅体现在中美力量对比方面，而且更多体现在中美政策变化方面。美国方面 2009 年的主线是适应中国的崛起。克林顿政府考虑如何与中国交往，小布什政府让中国分担责任，而奥巴马政府则是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奥巴马政府不仅考虑中国的利益，并在敏感点上承认和让步，而且考虑与中国分享一些权力。当然，美国对华政策不同领域之间存在不平衡，如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政治却对中国保持警觉与防范。而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变化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经过多轮磋商的 2009 中美联合声明中这一点很明显。二是全球治理上逐渐对美国采取主动，例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也开始提出自己的条件。但是，如马占武所言，中国整体的国家战略是继续实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 五、中美关系展望

### 1、中美关系的前景与目标

邓小平说过，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世界在变，力量对比在变，全球和地区格局在变，中美两国在世界和亚洲的地位也在变。所以，刘学成研究员认为我们要从这些变化的趋势中寻找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轨迹，要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审视中美关系。关于中美关系的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杨成绪研究员认为，从短期来看，中美关系可能起伏不定甚至变化无常。许多问题都可能成为 2010 年的新问题，如美对台军售问题、伊朗核问题上的新变化等。从中期来看，中美更加相互依赖，但可能中国更离不开美国。相互依赖使中美同舟共济，即使在不翻船的前提下双方也免不了争执与吵闹。从长远来看，他认为中美关系前景黯淡，安全困境可能使各国采取措施防范对手并保护自己的利益。

与会专家们还对中美关系的目标进行了热烈讨论，即中美关系稳定是目标还是手段的问题。袁鹏研究员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未必等同于中国国家利益。中美关系的发展，总是要符合国家利益。中美关系的稳定是相对简单的，例如继续买国债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一种手段，但是这是否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吻合就有待考证。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考虑中美关系稳定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平衡问题。黄仁伟研究员赞同该观点，认为有时候中美关系被迫的适度不稳定也是必要的。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丁幸豪教授则指出，从历史与大趋势看，中美关系的稳定对我国国家利益利大于弊。

马占武参赞与陈东晓研究员则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是目标，有一定价值，但不是唯一目标。陈东晓研究员认为，双方利益的交织、平等性的加强、对对方核心利益更加准确的把握、越来越成熟的对话机制等都已经使中美关系基本走出了大起大落的阶段。但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并不是唯一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合作的、积极的和全面的关系。

### 2、影响中美关系前景的不对称因素

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两个重要行为体，中国和美国国际地位存在着对称与不对称。刘学成研究员认为这种对称与不对称包括几个方面，美国是全球“一超多强”格局中的一超，中国是亚洲一超多强格局中的一超；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当然领袖，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不愿当又不得不出头露面的代言人；美国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传统发展模式

的代表者，中国是“权威政治和混合经济”新型发展模式的开拓者。未来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而是所谓的发展模式之争，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的竞争。所以中美国际地位的不对称决定了所谓 G2 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关系的互动与交错。中美既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协调。在合作中有一致和共识，也有摩擦和分歧。对于 G2 的说法，温总理明确说没有 G2，而学者私下认为至多只是 G1+1，即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虽然作为经济体很大，但是绝对还不强。

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矛盾与问题。王缉思教授认为，美国强调“全球治理”，即政府干预后还希望由市场推动。而中国强调“国际机制”，即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机制。这点不同使中美矛盾不可避免。袁鹏研究员也认为，中美之间有三对矛盾，即大国人口对西方资源能源的压力、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对西方政治的压力与挑战、没有完全解决主权问题的国家崛起对西方形成的军事和安全上的挑战。

中美关系中的不同领域也存在着诸多不对称。袁鹏研究员指出，中美关系中政治经济关系不错，军事关系滞后；战略合作很深，但是战略互信不好；精英关系好，但是民间反应不佳；其他国家对中美关系的担心和中美自己的看法也有差距。王缉思教授也赞同指出，中美经贸关系和各方面交流都得到了加强，但是军事关系没有加强，这值得警惕和防范。

### 3、对中国外交的建议

乐玉成司长在主题报告中指出了当前中国外交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对外交突发事件的敏感性与应对能力、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与外交理论的发展、一些国家面对中国发展的失落感的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新危机与新挑战如气候变化、保护主义、粮食安全等等。他指出了远程投送能力、机动能力对中国保障海外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两大“哑铃”，即中日韩合作与东盟，同时也肯定了“中非论坛”、“中拉论坛”、“上合组织”等战略平台对中国争取经济政治战略资源的积极意义。具体而言，与会者就中国外交如下几方面提出了建议。

首先是中国的外交姿态。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采取低外交姿态。夏立平教授认为中国对美战略应姿态低，也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外交姿态上尽量把握三点，一是不要引起美国的警惕，二是不要引起中小国家的担心，三是不要成为众矢之的。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三独（台独，藏独，疆独）问题。刘学成研究员也认为在保持我外交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同时，应避免对抗，在竞争中保留妥协和讨价的余地。乐玉成司长在演讲中也主张中国模式的“三不”，即“不照搬、不对立、不推广”。刘学成研究员则补充认为，我们需要对中国发展模式要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阐述，包括政治观、发展观、安全观、外交观以及文明观等，使之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功之路，但同时也可以进行适当宣传。

其次是关于思维创新。夏立平教授认为中国外交要尽量思维创新。比如针对美国所提“软实力”，中国是否可以提“结构实力”等。其实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是建立在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上的。没有实力和影响力，就没有话语权。郭宪纲研究员指出，中国曾经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使中国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而现在美国提出的“无核世界”似乎使美国站得更高。所以中国应该适当回应，如提出“中东无核化”。马占武参赞等多位与会者则提出了“中美利益交换”的提法，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基于利益”，而非“友谊”。

再次是关于中国外交的具体策略与重点。一是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刘学成研究员认为，中国应有机结合对美外交与周边外交。中美的博弈不仅在双边，已经延伸到中国周边和全球。所谓的全球重大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亚洲或中国周边，如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海上安全、

能源安全等。在强调开展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在经营周边方面，中国近年来有所疏忽和放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责任”影响下，背上了“不要背包袱”的包袱，放松了我开展主动的建设性外交斡旋，从而运用我影响塑造周边的努力，在周边三个战略支点上有所丢失。

“稳定、开拓和塑造”周边战略的实质就是建立睦邻友好圈。王缉思教授甚至指出亚洲即“中国及其周边”，所以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如以前要依托东亚，而是还要依托周边。

二是安全方面。多数学者指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是个重要课题。近些年海上安全冲突危险增加，因此危机控制将成为中美军事关系的重点。杨毅少将认为中国要坚持海上磋商机制，同时保持能够全球机动的舰队。阿巴问题上，与会学者的意见不一。关于中国何时进入阿富汗的问题，杨毅少将主张中国首先可以高调呼应，动作谨慎，加强对阿巴的援助，并认为“后进入比早进入好，少进入比多进入好”。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教授则认为，巴基斯坦虽然是中国的侧翼，但是影响很大，中国必须在南亚加大干预力度，帮助巴基斯坦摆脱困境。黄仁伟研究员则指出我们需要做好美国撤出阿富汗后的准备，认为中国可以有三种存在形式的选择，一是以联合国维和名义，二是利用上合组织平台，三是与巴基斯坦形成准军事合作。

三是台湾问题方面，袁鹏研究员认为可以注意三点，即对军售问题要有知情权、变危机管理为危机预防、媒体炒作手段的利用。陶文钊研究员认为对台售武我们可以视所卖武器的档次来区别对待。刘学成研究员指出目前阶段美国售台武器还是不可避免，只是时间与方式（分开来卖还是合起来卖）的问题。黄仁伟研究员则认为美国虽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情报与军事支持，但是有所松动。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利用一些利益交换使其更加松动。

最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倪世雄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朱威烈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倪世雄教授认为这次会议“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分析深入、发言坦诚、评论全面、讨论热烈”。朱威烈教授认为这一年度会议正在成为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界的一个品牌。

记录整理：蔡翠红  
(未经发言人审阅)